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简 报

2014 年第 3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4 年 5 月 16 日

编者按

- 1.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李时宇 冯俊新
- 2. 新型城镇化为农民增收带来了哪些机遇? 李子联
- 3. 从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角度来推进市场化改革..... 张松林 孙文远 程瑶
- 4.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动力、加速度和润滑剂.....潘静 陈广汉
- 5.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工资上涨及政府投资的视角.....
.....宫旭红 曹云祥
- 6. 权力博弈视角下股权激励效应的再审视..... 徐宁 任天龙 吴创
- 7. 不同发展阶段出口学习效应的比较研究..... 佟家栋 刘竹青 黄平川
- 8.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产业涟漪效应研究.....谢建国 杨婷婷
- 9. 银行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 张良贵 孙久文 王立勇
- 10. 产业特质性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米运生 邓进业 陈勋
- 11. 随机寿命下财富短缺风险度量..... 张元萍 王力平
- 12.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章卫东 成志策 周冬华 张洪辉
- 13.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构观——一个正在涌现的研究域..... 刘林青 谭畅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面向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1.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

李时宇 冯俊新（中国人民大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基于多阶段世代交叠模型的模拟分析》，《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2012 年底，中国基本实现了“城乡居保”（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备带来的预防性储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特征对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备受关注。作为中国“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城乡居保的建立将会产生怎样的宏观经济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呢？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城乡居保制度的本质。城乡居保是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动用当期财政收入提供基础养老金（社会统筹部分），体现了该制度中的社会统筹成分；另一方面，个人通过本息累积的个人账户获得养老金，体现了该制度中的个人账户成分。

根据对城乡居保制度本质的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考察其社会经济效应。首先是宏观经济效应。随着城乡居保的建立，政府为参保人群（主要是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人员）的养老提供了一部分支持，将会降低参保人群中年轻人的养老储蓄需求，于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将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当然，由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也会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其次是收入分配效应。这又可以分成两种效应：第一种是参保人群和非参保人群（主要是城镇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由于政府是运用对全体人群（包括参保人和非参保人）所征的税来对部分人群（参保人）实施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通过这一机制实现了收入较高的非参保人群对收入较低参保人群的转移支付，这将有助于减轻此前社会保障体系中对城镇职工的过多倾斜，从而降低城乡差距。第二种是不同年龄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由于在制度实施之时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年人并没有为养老金做出贡献，但又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养老金，所以实际上得到了来自后代的转移支付。总而言之，城乡居保制度的推出，将同时产生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接下来，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城乡居保的政策设计，我们建立起一个多阶段世代交叠模型，来对上述提到的宏观经济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规模进行了模拟计算。计算结果如下：（1）宏观方面，有一定的短期消费刺激作用，但整体来看并不大，参保人群消费水平在短期内提高 3%，长期内提高 1%，而整体经济的总消费在短期内将上升 0.4%；同时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约 0.3%。（2）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要大得多，参保人群和非参保人群的收入差距将下降 7% 左右，因为全社会收入差距降低，社会总福利在短期和长期分别提高 0.5% 和 0.4%。而对于不同人群来说，目前接近退休的参保人群从城乡居保中受益最大，总效用提高将超过 1%；非参保人群中的年轻人则是福利转移的最大支付方，总效用降低 0.6% 左右。

总结研究结果后我们认为,给定当前城乡居保的低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城乡居保中政府转移的力度,即提高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补贴的水平,并不会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很大扭曲,但却能较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应该成为下一阶段城乡居保工作的推进方向。

2.新型城镇化为农民增收带来了哪些机遇?

李子联(江苏师范大学)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演进,更加注重农村剩余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将伴随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等制度的调整,因为后者对于激励和保障人口自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既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更是新型城镇化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媒介。

首先,农地制度的完善是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之一,而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地制度为农民带来了收益性和保障性。从收益性的角度来看,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不仅可以使农民在土地耕种中获取更长久的经营性收入,还可以使其在对土地进行转包、转租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财产租赁性收入;农地流转机制的完善则使农民能够在土地交易市场中按市场价格进行土地转让,以此在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过程中获取更高的土地收益。从保障性的角度来看,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及农地流转机制的完善弥补了农村社会保障力度的不足,从而使农民形成了较强的收入预期。它既带来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坚定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信心,因为即便农民在城市中难以获得工作,农村土地所带来的收益也能为其带来部分生存保障。这一转移为其带来了相较于土地经营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其次,户籍管制制度的放松能够在促进农民迁移后,实现其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户籍管制制度对农民增收的抑制作用在于:第一,它限制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劳动生产率也难以得到有效提高,这将使“留居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受到制约;第二,它还带来了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划分,使得剩余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转移后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这一由二元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一方面使“转移农民”在同等就业平台下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从而使其工资性收入受“隐性失业”的影响难以有效提高;另一方面则使“转移农民”的子女在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机会时,必须缴纳额外的“择校费”或是其他支出,这无疑增加了“转移农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其净收入水平。因此,户籍管制制度在增加了“转移农民”生活成本的同时,也阻碍了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一项旨在放松户籍管制的政策从理论上来说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最后,财政金融政策支农力度的加大能够预防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投入减少导致农业产出下降这一窘境的出现,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规模化经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扶持上。从对规模化经营的扶持来看,财政金融政策支农力度的加大能够为“留居农民”购置机械、农具和其他预付资本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进而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供技术要件,不仅能够弥补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劳动要素投入的不足,还能更好地促进人均资本的深化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留居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从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扶持来看,财政金融的支农政策应更加注重农民经营技术的提高,以使农民在具备规模化经营“硬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软件”的提升效应。因此,政府应在投入相应资金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参加种植技术、养殖技术以及进城岗前培训等各种能够提高其技术水平的培训。这一旨在提高其技术和知识水平的政策无疑能够促进其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3.从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角度来推进市场化改革

张松林 孙文远 程瑶(南京审计学院)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就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来看,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党和政府做出的非常正确的伟大决策。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日益严重,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且目前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见,虽然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可是却并没分好蛋糕,使得劳动人民得到蛋糕的比例越来越小。我们知道,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应该最终惠及到全体劳动人民。显然,目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到底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里并不打算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回答,下面仅仅从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角度来思考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

研究发现,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而降低。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证明,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促进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提高的市场化改革是其取得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一方面,转轨时期的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另一方面,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引起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导致中国业已恶化的劳动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该如何来面对这种两难局面呢?我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处于低位,但经济增长水平极其低下,此时推进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当时相对较高的劳动收入占比水平就是降低一定幅度也不构成问题。然而,在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取得巨大进步,而劳动收入占比却降为较低水平的今天,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想着怎样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要同时考虑怎样去分好蛋糕。

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兼业工人”向“专业农民”和“全职工人”的转变,能够减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而且还能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水平。据此,为了化解上述两难局面,当前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首要任务要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为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促进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真正市民化而成为“全职工人”,而且有利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转变为“专业农民”。

综上所述,当劳动收入占比处于较高水平时,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可以仅仅停留在怎么把蛋糕做大的层面上,但当劳动收入占比随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促进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下降,并最终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需要由仅仅怎么做大蛋糕转向同时兼顾怎么做大及分配蛋糕上,此时,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要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具体政策需要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展开。

4.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动力、加速度和润滑剂

潘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陈广汉(中山大学)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还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农村家庭往往只是部分成员外出打工,部分成员留守农村,而非“举家”迁移。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通过亲戚、同乡介绍的居多;在同一地区或单位,来自同一家乡的劳动力比例往往较大,即通常说的“抱团”现象。

怎么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这些独特现象?一方面,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较强的传统家庭观念,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打工通常不是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通过综合权衡收益和风险后做出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来自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约束,面临异地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来自家庭和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对劳动力流动和外出就业的作用尤为重要。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动力”是什么?我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收入越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越高;家庭相对于村庄的相对收入越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倾向也越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即使有了很大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家乡的参照人群,其家庭成员仍然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这会提高其外出打工的倾向。这表明当前较低的农业和非农经营收入所构成农村推力因素以及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所构成城市拉力因素是存在的,两者共同构成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源动力”。这有利于加快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同时也引发如何实现城乡融合的问题。

其次,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速度”何在?我们发现农村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率也越高,农村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做出迁移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经济理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分工还是进城后就业竞争力的考虑,人力资本都是影响迁移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让较高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劳动者进城务工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融合,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这个“加速度”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什么可以充当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润滑剂”?我们发现,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单个家庭外出打工的行为选择往往追随村庄其他家庭的行为,家庭外出打工率与其所在村庄外出打工率呈现同向变化趋势,即存在“同群效应”。可见,在“乡土社会”,社会互动对劳动力流动有着独特的作用,好比劳动力流动的“润滑剂”。不同于社会网络对城镇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多产生的是风险分担效应和示范效应。“抱团”迁移可尽量规避单个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风险;早批的外出打工者又会对后来外出打工者产生示范作用。

当然,中国农村劳动力驶向城市这趟“列车”也会遇到户籍、土地等方面的制度“屏障”。这需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5.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工资上涨及政府投资的视角

宫旭红 曹云祥(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以人均GDP表示的劳动生产率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由改革开放前的150多元上升到2012年的151345.8元。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资本深化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显著的资本深化趋势,不论是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都出现了上涨的趋势,这违反了“卡尔多典型事实”。新古典经济理论指出,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是资本深化的直接原因,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提高将促使企业以资本来替代劳动。近年来,中国工资的确进入上升通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以来中国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4.71%,实际工资达12.97%。招工荒、劳动力市场摩擦及工资上涨等问题频繁见诸报端,企业为了雇佣到合适的工人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

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是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根据经济效率进行分配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亚生,2005)。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政府在资本深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通过分解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VES），我们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进步、行业规模递增效应、工资上涨及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等因素，并运用制造业行业 1992-2009 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前沿技术进步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效率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仅在 1999-2009 年显著。由于行业性质的不同，技术进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明显。整体上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所支撑。“凡登定律”指出制造业的规模递增效应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规模递增效应，分行业实证研究显示，劳动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行业规模递增效应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就资本深化而言，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在 1999-2009 年作用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在 1998 年之后增长比较明显。分行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工资上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作用显著，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不显著。就转型期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而言，其在制造业及三个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中均显著。这说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投资在资本深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作用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相比工资上涨引致的资本深化，政府投资引致的资本深化不仅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而且会导致资本生产率的过快下降。这种资本深化推动的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的动态效率，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亟待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至少对于制造业而言，要继续完善要素市场改革，从而建立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此外，提高中国制造业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内需。

6. 权力博弈视角下股权激励效应的再审视

徐宁 任天龙 吴创（山东大学）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现代企业制度是人类在管理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创举。在这种制度下，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的筹融资问题，也为公司保证了卓有成效的管理，为其带来了无穷的活力。但与此同时，两权的高度分离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委托代理关系。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强化契约关系，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直到如今，由于对丧失公司控制权风险的规避，部分民营中小公司一直未敢尝试股权激励，尤其是当国美控制权之争等事件发生之后，多数公司更加谨慎地看待股权激励的“双刃剑”效应。因此，在该类公司中股权激励效应如何实现？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将对股权激励强度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权力分别在

股权激励效应实现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股权激励的推行以及公司治理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自股权激励制度被成功应用于实践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都针对股权激励及其治理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鲜有学者从权力博弈的视角来研究股权激励及其治理效应,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恰恰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对股权激励及其治理效应存在着重要影响。这一点我们能从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中清晰地看出。伴随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博弈,国美电器的股权激励强度与效应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大股东权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国美电器并未推行股权激励计划,而当经营层权力逐步撼动大股东权力之时,股权激励计划才开始启动,但此时激励方案已经成为经营层掠夺权力的工具,偏离了其预期轨道。由其可知,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人权力在股权激励实施上具有不可忽视但又难以掌控的内在联系,这两类权力的制衡与配置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人权力分别对股权激励强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效应,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人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通过将权力配置引入到股权激励效应研究之中,从权力配置的新视角解读股权激励强度及其效应发挥的过程,深入剖析股权激励作用机理,为股权激励研究与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

总之,合理的权力配置,能够减少合作行为中的谈判成本与监督成本,也是股权激励制度发挥预期效应的前提与基础。上市公司不能依靠股权激励计划来实现权力的均衡,而应该通过主动地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制度环境等对权力进行均衡地配置,从而更好发挥股权激励对于两类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实现一个良好的权力均衡配置循环。

7.不同发展阶段出口学习效应的比较研究

佟家栋(南开大学)、刘竹青(天津师范大学)、黄平川(福建省审计厅)

《不同发展阶段出口学习效应比较——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例证》,《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奇迹。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而到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尤其,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后,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与消费、投资一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有重要贡献。但是,出口贸易的发展是否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质量呢？出口贸易能否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即是否存在出口的学习效应？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关于出口学习效应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贸易学界的一个热点。不过，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出口学习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的识别与区分上。而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出口贸易两种效应的识别上，而认清不同发展阶段出口贸易对我国企业生产效率的不同作用可能更有意义，这一问题的明确无疑会促进我国企业由成本降低型的生产率提高向创新型的生产率提高转变。因此，立足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阶段，综合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倍差法，我们对入世前和入世后中国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无论入世前还是入世后，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都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但是，入世以后，参与出口贸易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出口学习效应的估计系数（DID 估计值）的显著性下降，入世前 DID 估计值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而入世后却只能勉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另一方面，DID 估计值的取值也大幅降低，由入世前的约 0.2 下降到入世后的约 0.06，降低了 2 倍还多。也就是说，入世后，中国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性和强度都在减弱，国内企业不能从出口贸易中再轻易地获得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

第二，出口学习效应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尽管入世后，内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下降了但仍显著存在，而外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在入世以后就变得不明显了。同时，相对于高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更小，且在入世以后逐渐下降甚至不再显著。

上述结论表明，尽管入世后，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企业从出口贸易中获得的生产率溢价越来越少，甚至表现出逐渐消失的趋势。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被迫在国际生产链的低端进行生产和加工，低技术产品或标准技术产品在出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国际分工地位和出口商品的结构特点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学习效果。因此，国内企业（尤其外资企业）必须意识到当前或不久的将来出口学习将不再是改善企业生产效率的一种理想选择，要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长期提高就必须重视装备条件、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作用，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型生产率提高的实现。同时，政府也要意识到那些试图通过鼓励出口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改善的措施正逐渐失效，必须制定新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向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发展，降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才是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根本。

8.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产业涟漪效应研究

谢建国 杨婷婷（南京大学）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产业涟漪效应研究——基于 135 部门的投入产出分解》，
《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1994 年,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据统计资料显示, 截止 2012 年底,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累计已由 1994 年的 75.67 亿美元上升到 3150.53 亿美元。面对不断增加的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贸易保护。1990-2012 年美国对世界反倾销立案调查数为 771 起, 针对中国的有 151 起, 占 19.6%, 其中 129 起被裁定倾销成立,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反倾销的主要受害国之一。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产品涉及面相当广, 按 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计算, 1990-2012 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产品涉及大约 39 个部门 100 余种产品, 除了传统的化工行业、贱金属行业和纺织业屡遭美国反倾销外, 近些年来机械运输、纸制品、家具制造等行业也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的新目标。

反倾销在对进口产品起限制作用的同时, 由于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 其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遭遇反倾销产品, 而会通过涟漪效应影响到关联产业。这种损害程度到底如何, 中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来降低倾销损害, 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美国对华反倾销的 100 个案例, 使用反事实估计方法, 得出每个涉案产品因反倾销带来的损害, 最后将涉案产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分类归总到 32 个部门, 通过部门间投入产出关联系数, 测算出被实施反倾销行业产出变动对其上下游产业产出影响大小。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相关出口部门上游产业的影响相当广泛, 32 个部门中有 25 个受到了反倾销的涟漪影响, 其中对上游产业影响最大的是钢压延加工业的反倾销, 因美国对钢压延加工业反倾销导致在反倾销实施后前两年给其上游产业带来了 65068.99 万美元损害; 其次是橡胶制品业, 反倾销对其上游带来了 25087.96 万美元损害; 紧随其后的是对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反倾销, 损害值为 24945.41 万美元。另外, 32 个部门中有 25 个部门表现出因遭遇反倾销导致其对下游产业带来不利影响, 影响最大的同样是钢压延加工业, 因美国对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反倾销导致在反倾销后前两年给其下游产业带来 76769.12 万美元损害; 其次是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美国对它的反倾销引发了出口的减少, 进而对其下游产业带来了 27360.52 万美元损害。

特定产业因反倾销影响会给其上下游产业带来损害, 同时, 产业本身也会受到各种来自上下游产业反倾销而产生的损害。32 个部门中有 30 个部门因上下游产业遭美国反倾销而受损, 其中损失金额最高的部门是金属制品业, 因美国对其上下游产业发起反倾销进而使得金属制品业损失金额高达 15167.1 万美元; 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因美国对其上下游产业发起反倾销进而使得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损失 10177 万美元; 钢铁压延加工业和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受损值差不多, 分别为 7812.12 万美元、7809.54 万美元。由损害分解结果可以看到, 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受反倾销损害最大的产业。

通过具体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 反倾销不仅对遭到反倾销的特定行业有影响, 且会对其上下游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些上下游产业的损害甚至超过遭遇反倾销产业本身的损害, 因而我们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减少美国对华的反倾销诉讼次数, 特别是对关键产品的反倾销, 更要高度关注, 采取必要措施, 降低反倾销涟漪效应给国内产业带来的不良影响, 以免

给国内产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9. 银行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

张良贵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王立勇（中央财经大学）

《银行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来自 1992-2010 年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其成败与否取决于能否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功能效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金融功能效应对资本形成、资本配置和金融创新有着关键影响。提到资本形成和资本配置，就要关注金融中介在金融系统的作用，特别是信贷市场中银行的作用影响。

现实中，代理人成本具有反周期特征，即当经济衰退时上升，当经济扩张时下降，这种周期放大效应被称之为金融加速器。金融加速器理论是由 Bernanke（1995）在研究大萧条经济现象时提出的，因为传统经济理论都以 MM 理论为前提，忽略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无法合理解释类似大萧条的经济现象。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学术界纷纷从货币政策传导、经济波动、社会福利和财富效应等角度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都充分证实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运行中有着重要作用。

信贷市场“松弛”状态的变化直接影响代理人成本变化，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信贷市场“收紧”对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更大。银行作为影响信贷供给“松弛”状态变化的关键主体，它的存在显著加强了经济波动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当银行所面临的成本向着不利方向变化时（如违约风险成本、资金成本和操作成本等），将进一步增强金融加速器效应。

既然银行通过改变信贷供给对经济周期中的放大效应——金融加速器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线性关系么？也就是说，金融加速器效应是否跟随信贷供给变化而单调变化。模拟数据显示，信贷供给变化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倒 U 型：初期随着信贷供给的增加，金融加速器效应随之增强；当信贷供给增加到某一阈值时，金融加速器效应随之减弱。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对银行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非对称性影响，而并非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一贯性表现。

银行只是企业外部融资中的间接融资渠道，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企业一直依赖的主要融资渠道。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直接融资市场必将得到快速发展。影响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核心动力来自利率市场化。正如近来存贷款利率政策的出台，都将对金融市场结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外部融资渠道变化（如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变化）、融资利率变化（如存、贷利率变化），以及金融抑制下影子银行变化（如规范银行非标业务操作监管政策的出台）都将对金融加速器效应及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显然，这些研究角度及研究成果都将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10. 产业特质性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

米运生（华南农业大学）、邓进业（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陈勋（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人们愈发关注银行效率的主要问题。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对银行效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在效率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银行业的整体效率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平？是哪些因素决定着银行的效率水平？又该如何提高银行业的整体效率？

运用麦氏指数（Malmquist index），我们计算了银行业的效率水平及其变化情况。分析对象是资产规模最大的 14 家银行。分析结果表明，在 1999-2009 年间，14 家银行的效率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4 家银行的效率增长速度从大到小的排序是：中行、建行、中信、广发、深发展（平安）、招商、光大、工行、民生、浦发、农行、交行、华夏。比较而言，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增长率（13.3%）要略高于 4 家国有商业银行（12.9%）。不过，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效率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影响我国银行业效率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产权制度。国有银行承担着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单纯的效率比较会低估国有银行的整体贡献。不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比较，国有商业银行确实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等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体制性因素从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产品创新等方面制约了银行效率的提升。计算显示，尽管初步实现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但我国银行业的国有化程度仍然是比较高的。这不但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改善，也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整体提高。

二是市场结构。随着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看，市场结构仍然属于寡头垄断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既制约了自身的效率改善，也不利于银行业整体效率的提升。

三是产业特征。银行的产业特质性主要表现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和创新性四个方面，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安全性（以资本充足率衡量）对银行效率的促进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但效果不甚显著。（2）“流动性”问题对银行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在 1999-2009 年间，我国银行业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并遭受到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面对不利的外部冲击，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行为变得谨慎起来。（3）经过改革初期的阵痛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并对银行效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4）金融创新对银行效率提升的重要性在逐渐强化，银行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正在初步形成。这对于只有十几年市场磨练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实属不易。（5）金融发展对银行效率的提升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这可能是因为金融规模尚不足以产生足够的专业化经济。这亦暗示，我国银行业尚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

要提高银行业的整体效率，需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微观方面的建议是：银行业需要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维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业需通过开拓新市场、研

发新产品等方式,加快金融创新;保持适度规模的流动性并提高长期盈利能力,对于效率的提升也是必要的。宏观层面的建议是:银行业需要依靠创新来实现集约式和内涵式增长;同时要进一步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比重;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强化银行业的市场竞争。

11. 随机寿命下财富短缺风险度量

张元萍 王力平(天津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目前人口寿命有了很大提高,“四世同堂”的家庭早已屡见不鲜。长寿能让老年人尽享天伦之乐,这自然是好事,但也会给老年人带来一定风险。这种风险是什么呢?在小品《不差钱》里面,有一段赵本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就是人还活着,钱没了”。虽然是玩笑话,却一语道破了长寿造成的风险,也确实确实反映了当下的养老问题。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退休老年人的收入不外乎一些固定的退休金以及为数不多的保障金,可这些固定收入难以抵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侵蚀与影响,如不断上涨的物价,还有随着年龄渐长而大量支出的医疗护理费,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手中的财富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大的开销,长寿风险(或财富短缺风险)便显现出来了。这种风险一直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国家。如同其他风险(比如股市波动风险)一样,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种风险有多大,或者是有什么特征?要避免这种风险应该保有一个怎样的财富增长率,或者说,光靠银行存款是否可行?从银行的角度来讲,要开发设计养老金融产品,应当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率才能满足养老需求?

对于长寿风险(财富短缺风险)的度量,我们还是从两个角度考虑:一个是“人还活着”,另外一个“钱没了”。每一个年龄上的长寿风险都不一样,在某个年龄(如80岁)上的长寿风险可以理解成为,在80岁,老年人“还活着”,同时“钱没了”的概率有多大。

“人活着”的概率可以根据现有的死亡数据进行预测,在这种预测下,每个老年人在每个年龄段上都面临着相同的存活率。“钱没了”的概率可以从老年人的收入和消费造成的财富变动去计算。然而,不同的老年群体收入和消费模式不同,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别:基准群体(乐享晚年生活的老年群体),遗赠群体(想给自己子女留下一笔财富而节俭消费的群体)以及独居群体(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也没有子女的群体)。这三类群体在每一个年龄段上的“钱没了”的概率不同,因此面对的长寿风险也不同。

经测定,由于老年人在退休时手中都有一定储蓄,因此长寿风险在75岁以后才开始慢慢显现。拿基准群体来说,如果将储蓄全都存入银行,按比如4%的年利率来算,到82岁,会有将近四成的老年人暴露在长寿风险之下;如果老年人进行一些简单的理财,假定年化收益率8%,那么到82岁发生财富短缺的概率不到一成。

而且,三类老年群体长寿风险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走势,长寿

风险最大值一般出现在 90~92 岁之间。在各个年龄段上, 遗赠群体因其节俭消费所以长寿风险水平最低, 独居群体因其没有额外收入来源所以更早地达到了长寿风险峰值。

长寿风险的大小关系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为老年人选择理财产品提供了一定参考, 同时也为银行设计养老金融产品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

12.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

章卫东 成志策 周冬华 张洪辉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我国自 80 年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后, 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转变。政府将绝大多数的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 企业拥有了一定的自主经营权, 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放权让利”式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对企业的行政性干预, 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和投资项目、行业准入等各种审批权, 因而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交给企业, 这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干预的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负担。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权力配置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决策权, 也获得了财政自主权、经济管理权等权力。与此同时, 诸如就业、社会养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由各级地方政府来承担 (程仲鸣等, 2008)。另一方面, 政府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80 年代以后, 我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了经济绩效指标, 这些显性指标包括地方 GDP 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就业指标等, 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地方官员的升迁也有着重大影响 (李宏彬和周黎安, 2005)。而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政府的诸多公共治理目标 (魏明海和柳建华, 2007), 政府有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 政府对企业投资的行政干预造成了企业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低效益的投资, 即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问题。

与西方国家企业从“多元化”经营转为“单一化”经营倾向不同, 我国的上市公司近些年来却出现了多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现象 (林毅夫, 2007; 柳建华, 2009)。究其原因, 这可能是由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的, 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行政上实现“超强控制”。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权仍由各级政府部门控制, 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更多地对决定自己任免资格的政府部门负责, 进而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因满足政府的要求而进行多元化经营, 如增加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环境、投资新兴产业和增加当地的税收以及促进 GDP 的增长等。

但西方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代理理论很难完全解释我们国有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这一现象。我们从政府干预角度出发, 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并考虑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会

干预国有上市公司，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显著；多元化是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的相关程度更大，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容易导致多元化经营。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针对如何解决政府干预下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而产生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1）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一套国有企业管理者选拔的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行政直接任命，切断政府利用政治关联来干预企业的途径。这样可以使得企业的管理者免受政府的压力从事过度投资和多元化经营。（2）改变“唯 GDP 论”的考核机制。只有破除 GDP 至上的思想，地方政府才不会有动力促使企业无效率的过度投资，因此，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关键在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的变革。

13.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构观——一个正在涌现的研究域

刘林青 谭畅（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战略管理和国际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一直存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争。争论的焦点在于：国际市场上，国家之间会不会像企业那样相互竞争？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出口什么国家之间进行要素禀赋比较的被动结果，不会像企业一样相互竞争。与之相反，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产业布局呈现高度结构化，产业集群化是当代国际竞争的重要特征；对于参与国际竞争来说，拥有国家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且国家可扮演积极角色。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争论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领域的一道难题，也阻碍了该领域的理论创新。

进入 2005 年，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郝思曼(Hausman)、罗德里克(Rodrick)、克林格尔(Klinger) 和海德格尔(Hidalgo)（简称“HRKH”）发表了两篇路径开创性论文，聚焦于研究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组合（即出口篮子）。一篇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出口技术复杂度”概念，并实证表明出口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另一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产品空间”工具，可视化一国优势产业组合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研究发现产品空间是高度异质的，国家通过改变优势产业组合实现结构转型。这些新颖的结论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优势产业组合的研究兴趣，“出口质量”、“出口多样性”等更多的结构性问题被提出。从 2012 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运用产品空间研究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如刘林青等借鉴产品空间的研究，创新性地出“国家空间”概念。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构观，这个由发展经济领域的专家团队推动的新学术研究领域正在涌现。

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结构观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三种理论观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较优势理论重点解决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及贸易方向，竞争优势理论聚焦于帮助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结构观则关心出口什么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竞争优势理论还是结构观，都肯定要素禀赋在决定国家出口专业化模式上发挥的基础性

作用,但并不将之作为唯一因素;因此,竞争优势理论和结构观可以视作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结构观的萌芽。最重要的是,竞争优势理论与结构观在核心观点上相当一致,且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互补,具体表现在:首先,两者都承认经济发展中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不过前者关注发展阶段和结构转型的整体运行特征,后者更为关注结构转型过程中产业(产品)如何变迁,两者正好互补;其次,两者都承认产业(产品)空间是异质性的和结构化的,两者都试图将这种结构可视化,而产品空间可视化技术容易获得国家层面的纵贯数据,有助于竞争优势理论的实证检验;最后,与比较优势理论不认同国家会像企业一样竞争相反,两者都认同或展现国家的诸多“企业化”行为,这也意味着源自企业的微观理论来解释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国家行为有极大的潜力。

新兴的结构观不仅凸显国家展开优势产业组合设计和升级的重要性,在与竞争优势理论形成互补的同时挑战比较优势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一种新路径去可视化国家的竞争行为,深入研究国家如何通过有效的优势产业组合设计去参与国际竞争、赢得竞争优势。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0 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本刊坚持“让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12 和 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在最新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69 种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25 种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 版）》和《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3 版）》中，《经济评论》连续两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